

浙江非农经济发达地区耕地撂荒问题分析——以余姚市低塘街道为例

桑广书, 欧玉婷, 陈焯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系, 浙江金华 321004)

摘要 耕地撂荒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非农经济发达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浙江沿海更为突出, 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以浙江省余姚市低塘街道为例, 分析了 1992-2005 年低塘街道耕地撂荒的时间变化过程、空间分布特点及引起耕地撂荒的经济和社会原因, 为长三角地区耕地撂荒问题提供分析案例。

关键词 非农经济发达地区; 耕地撂荒; 低塘街道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7)05-01459-03

Analysis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ing in Developed Areas of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in Zhejiang Province

SANG Guang-shu et al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321004)

Abstract Cultivated land abandoning wa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developed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areas of China since the late 1980s. And the problem became more prominent in coastal province of Zhejiang, which should be resolved dur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Ditung street of Yuyao city was selected as an example after thorough investigations. Time variation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s well a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reasons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ing from 1992 to 2005 were analyzed, which provided an analysis case of cultivated land abandoning in the developed areas of China's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particularl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Key words Developed areas of non-agricultural economy; Cultivated land abandoning; Ditung street

耕地撂荒现象是发生在耕地利用中, 由于生产经营者主观原因放弃而造成的耕地处于闲置或未充分利用的状态^[1]。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 由于浙江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 农业部门各生产要素向可获得性报酬较高的非农业部门流动, 耕地撂荒形势越来越严重。耕地撂荒使浙江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 正确认识浙江非农经济发达地区耕地撂荒的时空特征、经济与社会动因, 对客观认识浙江省耕地撂荒现象,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对策具有现实意义。笔者选取浙江省余姚市低塘街道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对非农经济发达的低塘街道耕地撂荒问题研究, 为长三角非农经济发达地区耕地撂荒问题提供案例。

1 低塘街道概况

低塘街道位于浙江省余姚市, 北濒杭州湾, 南连余姚市郊, 东临慈溪市区, 是连接余姚、慈溪、上虞的纽带, 处在宁绍平原的中心。街道境域面积 54.84 km², 为亚热带季风气候, 年平均温度 16 ℃, 降水量 1 300 mm, 降雨主要集中在 4-6 月的梅雨季节和 7-9 月的台风季节。土壤为典型的组合型平原土壤, 土层深厚, 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优越。

2004 年低塘街道有人口 4.03 万人, 区域内交通便捷, 329 国道和连接沪杭甬高速公路的 1 级专用公路横贯街道辖区,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桥头距街道办事处仅 10 km。交通条件的改善, 使低塘街道成为余姚市乃至宁波市主动接轨上海, 融入长三角经济圈的桥头堡。2002 年实现经济总量 92.1 亿元, 其中工业产值 75.3 亿元, 三产增加值 13.2 亿元, 农民人均收入 8 400 元。低塘街道已成为浙江省经济百强乡镇和宁波市十强镇之一。

2 耕地撂荒的时空特征

2.1 耕地撂荒的时间波动 根据低塘街道统计资料, 1992-2005 年每年耕地平均撂荒面积 471 hm², 占耕地面积的 18.86%, 远高于浙江省 0.5% (1994 年) 的水平; 年均复

种指数 193%, 低于浙江省“九五”时期的 216%。1992-2005 年耕地撂荒及复种指数波动状况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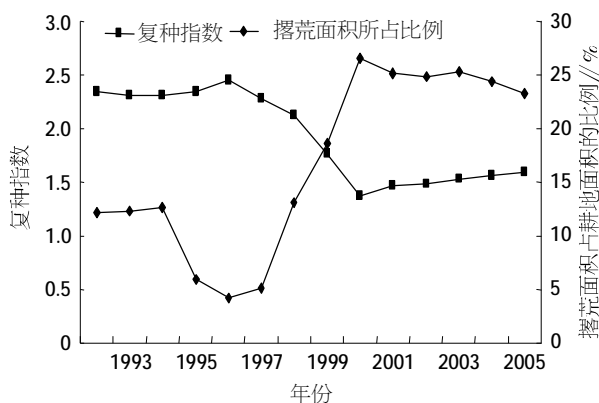


图 1 1992-2005 年低塘街道耕地撂荒变化情况

从图 1 可以看出, 耕地撂荒程度与复种指数呈负相关。1992 年耕地撂荒面积 359 hm², 占耕地面积的 12.11%; 1993-1994 年耕地撂荒面积呈缓慢上升的趋势。随着农村二轮承包的全面落实和粮价的上涨, 1995 年耕地撂荒面积开始急剧下降, 1995-1997 年连续 3 年撂荒面积在 6% 以下, 其中 1996 年仅为 119 hm², 占耕地面积的 4.19%, 为研究期的最低值, 同年的复种指数也是研究期的最高值, 达 246%。1998 年以后撂荒面积出现强力反弹, 2000 年达到 680 hm², 占当年耕地面积的 26.52%, 为研究期的最高值, 同年复种指数也是研究期间的最低值, 仅为 137%。2001-2003 年耕地撂荒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一直在 25% 左右, 直到 2004 年国务院发出要求尽快恢复撂荒地生产的通知, 撂荒面积才开始回落。2000 年后尽管复种指数处于缓慢上升状态, 2005 年达到 160%, 但仍远低于研究期间的平均值。

2.2 耕地撂荒程度的区域分布 从 2004 年耕地复种指数的分布看, 低塘街道 11 个行政村的撂荒程度与交通的便捷程度密切相关: 距离公路越近, 耕地的复种指数越低, 撂荒程度越高; 距离公路越远, 耕地的复种指数越高, 撂荒程度越低(图 2)。由图 2 可见, 329 国道横穿的 3 个行政村, 低塘、历山、洋山复种指数最低, 均在 130% 以下, 其中有次级

作者简介 桑广书(1963-), 男, 陕西陇县人, 博士, 副教授, 从事自然资源学、地貌学与土壤侵蚀、旅游地理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 2006-11-03

公路相连的低塘、历山更在 120 % 以下;次级公路过境的 3 个行政村,芦城、郑巷、后郑巷次之,在 135 % 左右;位于区域中心,无公路过境的 2 个行政村黄清堰、汤家闸复种指数最高,在 170 % 以上;区域边缘的 3 个行政村的复种指数与交通的关系表现得更为明显,位于主要公路和次要公路交界处的镬剑山复种指数最低,次要公路横穿的姆湖次之,离公路较远的黄湖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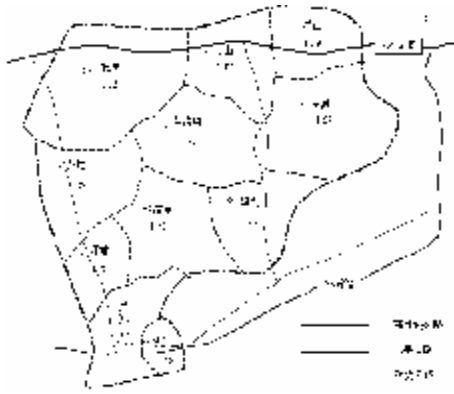


图 2 低塘街道各行政村耕地撂荒程度

公路沿线的行政村交通便利,随着非农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成为企业拓展、商家投资的首选^[2],从而使大量耕地被征用,撂荒问题严重。例如,历山村在 2001 年被帅康集团一次性征用土地 26.68 hm²,大量良田荒置,当年历山村的复种指数仅为 119 %。

3 耕地撂荒的经济原因

3.1 经济原因是驱动耕地撂荒的前提 市场经济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经济,价值规律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调节生产、分配、消费的平衡关系,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3]。中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农户是独立生产经营、自负盈亏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农户拥有较充分的经营自主权^[4]。一方面农户成为能独立进行商品生产和经营的农业生产经济实体;另一方面农户还成了有限资源支配的主体,对自身的劳动力、承包地、生产中资本量和技术投入量等有近乎完全的决策权。第一轮家庭承包责任制期间,中国农产品短缺,加上农户生产要素使用的地域范围受限制,解决温饱成为农民的首要决策目标,经济目标次之^[5]。农村经济水平的提升,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打破了农村封闭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各生产要素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流动的限制性条件逐步消除,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成为农民的首要目标,农户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用可支配的有限资源实现纯收入的最大化。农业部门内各生产要素

向可获得性报酬高的非农业部门流动,是市场规律发生作用的直接表现,由此导致农地被大量撂荒。

3.2 驱动耕地撂荒的因素

3.2.1 农户种田收益低。农民经营农田的收益决定于农田的投入水平和作物的产出效益。近年来,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农户种田比较效益下降。

从 1997 年下半年开始,粮食、棉花、油料、畜禽、水产品等价格走低。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信息显示,1998 年 1 月,3 种粮食(大米、玉米、小麦)在全国集市的平均价为 1.71 元/kg,较 1997 年同期下降 9.8 %。其中大米为 2.28 元/kg,下降 16.2 %;小麦为 1.46 元/kg,下降 11.2 %。1998 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比 1997 年下降 8 %,粮食收购价格比 1997 年下降 3.3 %;1999 年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为 1998 年的 87.8 %,其中,粮食类为 1998 年的 87.1 %。中国价格信息中心对全国粮食主产区的调查显示,1998 年 10 月下旬,全国小麦、稻谷、玉米和大豆每 50 kg 的实际收购价格分别为 64.57、62.07、56.11 和 111.67 元,分别较 1997 年下降 11.55 %、16.12 %、8.76 %和 2.04 %。到 2000 年,全国小麦价格已降至 0.80 元/kg,稻谷降到 0.60 元/kg,下降幅度均在 50 % 以上。

与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相比,农资价格指数下降的幅度却较小。如浙江省 1997 年为上年的 99.7 %,1998 年为 92.4 %,1999 年为 95.8 %,2000 年为 100.4 %。其中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反而逐年上升,尿素的价格 1992 年为 800 元/t,2000 年升至 1 500 元/t 左右,种粮成本几乎以每年 10 % 的速度增长。这样,农产品收益逐年下滑,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撂荒现象严重。

据实地调查,低塘街道历山村,农户甲 1994 年耕种土地 0.16 hm²,收获晚稻米 1 068 kg,在不考虑劳力成本的情况下,获净收益 11 394 元/hm²;2001 年耕种土地 0.08 hm²,因粮价上涨速度小于农资成本上升速度,收益下降至 10 125 元/hm²,农户种田积极性受创,在 2000 年前后,耕地撂荒程度达到极值。此后由于粮价的上涨,农业税的取消,种田效益回升,耕地撂荒现象才受到抑制(表 1)。

3.2.2 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是农户的目标。现阶段,我国非农领域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农业部门。据调查,低塘街道黄清堰村一纯农业户 2005 年的纯收入为 5 000 元左右,而 2002 年低塘街道农民人均收入就已达到 8 400 元。所以,只要非农部门能获得就业机会,农村劳动力更愿意选择非农部门,甚至当非农部门提供的劳动报酬比农业部门稍低时也是如此,因为农

表 1 低塘街道历山村农户甲农田耕作收支情况

年份	耕地面积//hm ²	稻谷产量//kg	晚稻米价格//元/kg	收入//元	生产资料成本//元	农业税//元	支出//元	纯收入//元
1994	0.16	1 068	2.10	2 243	348	72	420	1 823
1997	0.16	1 106	2.00	2 212	480	96	576	1 636
2001	0.16 ^①	555	2.40	1 332	330	192	522	810
2005	0.16 ^①	539	3.20	1 725	390	0	390	1 335

注:①表示耕种 1/2,撂荒 1/2。

户在农业生产经营中要承担各种风险,而仅提供劳动力时承担的风险要小得多。因此,农业部门大量劳动力流向非农业部门,导致大量农地被弃耕撂荒。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从业人员比重提高,劳动力流动的范围扩大。2004 年底,低塘街道实有劳动力总数为

26 428 人,其中,从事农业的人员为 4 393 人,占 16.62 %;1992 年从事农业的人员要占劳动力总数的 48.43 %。2004 年低塘街道从业人员主要从事的行业结构比例见图 3。据 2005 年 11 月对低塘街道历山村 300 个农户的访问、调查,纯农业户占 3.0 %,非农业为主的兼营农业户占 39.33 %,离

土农业户占 57.6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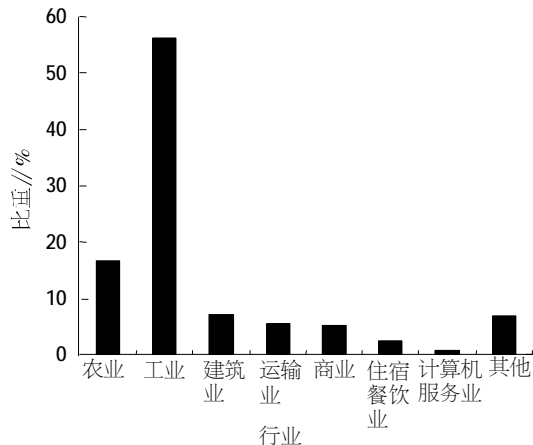


图 3 2004 年低塘街道从业人员主要从事的行业结构比重

4 耕地撂荒的社会原因

4.1 农村青少年一代弃农现象严重 农民本是一种职业概念,与教师、工程师、医生、商人一样属于不同的社会分工,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然而受数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农民这一职业被赋予了社会地位的含义,在封建社会农民处于社会等级的底层。这样直至现在,众多农村人口不愿当农民,在青少年一代尤其突出。据对低塘街道历山村 300 户农户进行的调查,所有的农户都认为只有在没有其他方式谋生的条件下才会选择种地,118 个农业兼营户年龄都在 50 岁以上,9 个纯农户都是 65 岁的老人。对舜耕小学 6 个年级 276 名学生和群力幼儿园 48 名小朋友调查结果显示,对“长大了做什么”的回答,只有 3 个小学生写“想当一个农民”。对历山中学 15 个班级 738 人进行“理想中的职业”调查,结果没有 1 人愿意当农民。

4.2 农村土地流转刺激部分农民弃耕 部分农户,特别是非农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有转让土地的愿望。1993 年初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对 1 万个农户调查显示,5.1% 的农户愿意转出承包地,10.8% 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愿意转出承包土地,65.9% 的农户愿意维持现状。2000 年以后,沿海非农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速度加快、规模扩大。1998 年浙江省参与流转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7%~8%,2001 年 3 月底该省参与流转的土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13.1%,土地流转涉及的农户数占农户总数的 20.8%,其中余姚市至 2000 年底已流转耕地占耕地总面积的 24.8%^[6]。低塘街道历山村耕地流转情况更为严重,2005 年各组耕地流转情况见表 2。

表 2 低塘街道历山村各组土地流转情况 %

	全部转让	部分转让	渴望转让
历山组	34.7	100	100
上陈组	11.3	43.2	100
界堰组	6.1	11.8	100
沥网组	5.8	8.9	99.8
徐家组	3.2	5.7	97.9

由于土地流转可获得可观收益,历山村村民多愿意甚至渴望出让土地。如 2001 年历山村历山组被帅康集团征地 26.68 hm²,农地征购价为 15 万元/hm²,加之政府对土地转出农户每户补贴 5 000 元,所以每个农户若土地完全转让,有近 3 万元的收入。经济因素的驱动,致使农户多乐意转让土地。即使少数农户不愿转让土地,主要是考虑其长远生存,

这部分农民年龄多在 65 岁以上。

4.3 农业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减小 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低塘街道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图 4)。第一产业在低塘街道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 1992 年的 16.98% 降至 2004 年的 2.43%;第二产业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并稳步上升,至 2004 年达到 90.79%;第三产业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于 2000 年超过第一产业并不断增长。这说明农业收入在非农经济发达区农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已越来越小,农民已经从二、三产业中获得了稳定的收入,农民的实际职业已经发生转化,在生产上已经脱“农”,不再依赖于农业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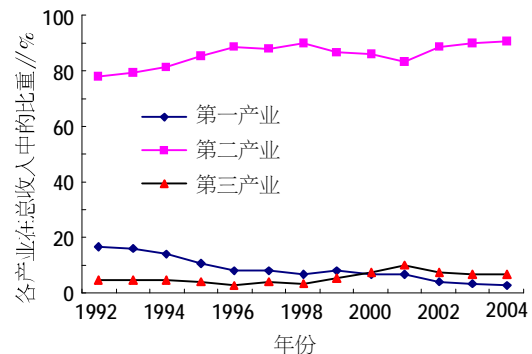


图 4 低塘街道各产业在农民总收入中的比重变化

1997 年以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撂荒问题加剧,撂荒面积与非农产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保持同步,说明在非农经济发达区离开土地转向二、三产业已逐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农业是否有收成、耕地是否有足够的产出,对非农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来说已不再重要,对土地采取集约方式还是粗放方式,甚至弃耕已可泰然处之。以历山村为例,到 2000 年农业在农民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已越来越小,1 个兼业农户一般耕种农地 0.066 7~0.133 4 hm²,0.066 7 hm² 农地种植单季稻,毛收入约为 1 000 元,纯收入为 600~700 元。1 个家庭的农业年收入最多在 2 000 元左右,这正好与 1 对夫妇在工厂工作的月收入相当。2005 年历山村普通家庭的年均收入为 25 000 元左右,农业收入最多占家庭年收入的 8.0%。

4.4 农民完全寄希望于土地已不现实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消费水平有了显著提高。2005 年低塘街道历山村普通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为 1.5 万~2.0 万元,而其中的粮食消费支出仅为 1 200~2 000 元。浙江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粮食消费支出不仅所占比例小,而且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逐年递减,与此同时,货币性消费支出在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例逐年增长,2003 年占到 93.77% (图 5)。现阶段医疗消费和教育消费在农民消费中的比例增长尤其明显,成为农民消费的主要负担。2005 年余姚市幼儿园学生平均每生年收费约为 1 800 元,小学约为 1 200 元(若包括数学、英语兴趣小组辅导费,则约为 2 900 元),初中约为 1 800 元(若包括各种补习费和资料费约为 2 600 元),高中公立学校约为 2 500 元,私立学校约为 13 000 元,全国大学第 1 批录取的学生学费约为 6 000 元/人,第 3 批录取的则需另加 15 000 元/人左右。所以 1 个普通农民家庭若有 1 个大学生和 1 个中学生,单学费支出每年就至少需 8 000 元左右,单纯依靠

(下转第 1463 页)

(上接第 1461 页)

土地收入显然不切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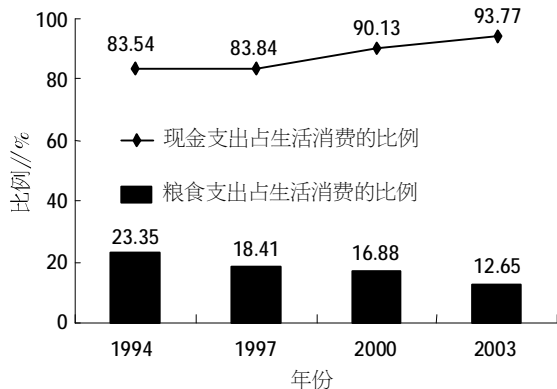


图 5 1994~2003 年浙江农村居民粮食支出与现金支出的变化趋势

消费水平的提高,货币性消费支出比例的扩大,粮食消费支出比例的减小,说明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事事都需花钱,农民必须具备赚钱的能力和增加现金收入的途径。农地的现实产出告诉农民,在非农经济发达区,单靠耕地产出对众多农民来说已不可能满足生活消费支出的货币需求。

5 结论

通过对 1992~2005 年浙江省余姚市非农经济发达的低

塘街道耕地撂荒问题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 耕地撂荒过程具有波动性,这种波动性的产生主要由农业比较效益决定。耕地撂荒在区域分布上与交通的便捷程度呈正相关,即交通越便捷,越易于产生耕地撂荒现象。

(2)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因素是驱动耕地撂荒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种田收益低,在非农经济发达区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领域转移,多数农户已转变成离土农户。

(3) 在非农经济发达区耕地撂荒的社会因素主要表现在,长期受传统观念的影响,青少年一代弃农现象明显,农村土地流转所带来的可观收入刺激部分农民弃耕土地,农业收入在农户收入中的比重减少,以及农民完全依靠土地已难以满足实际生活中对现金支出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 张斌,翟有龙,徐邓耀,等.耕地抛荒的评价指标及应用研究初探[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3,24(5):49-52.
- [2] 崔晓天,程建学.城乡社会经济与公路网发展互动关系分析[J].交通规划,2004,6(1):9.
- [3] 祁恒君.浅析市场经济下物流系统的发展[J].甘肃科技,2005,21(3):176-177.
- [4] 吴新慧,孙秋云.社会学视野下的近年农村土地抛荒问题浅析[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4,1(1):51-54.
- [5] 张怀献,范和平.安徽省耕地抛荒周期性波动初探[J].安徽农业科学,2002,30(3):496-498,503.
- [6] 王丽琦.农村土地抛荒的“新土地革命”的社会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2002,4(1):30-35,40.